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 (第八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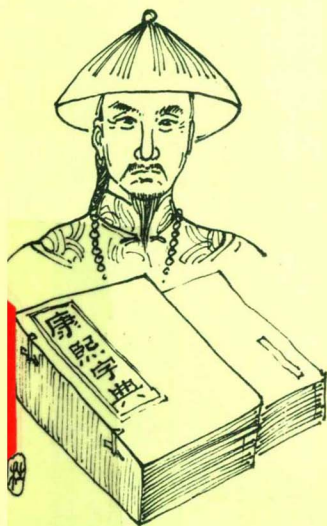
总主编/李玉明

陈廷敬与《康熙字典》

刘伯伦

／著

陈廷敬作为康熙皇帝的辅弼良臣，对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康熙之治”和文化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山西人民出版社

责 编:武 静
复 审:周 红
终 审:刘秀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廷敬与《康熙字典》/刘伯伦著.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3. 3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 第8辑/李玉明主编)
ISBN 7-203-04752-0

I. 陈… II. 刘… III. ①陈廷敬-评传②康熙字典-研究 IV. ①K827=49 ②H1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0388 号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 第八辑

陈廷敬与《康熙字典》

刘伯伦 著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0351-4922102

http://www.sxep.com.cn E-mail: sxep@sx.cei.gov.cn

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力新印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印制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4.375 字数:350千字

2003年3月第1版 2003年3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套

★

ISBN 7-203-04752-0

K·297 定价:30.00元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顾问：王 谦 李立功 王庭栋 任继愈
马 烽 姚奠中 侯伍杰 申维辰

主任委员：赵雨亭

副主任委员：李玉明

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玉山	马志超	王志超	王宝库
王灵善	牛崇辉	白云	任茂棠
刘 江	刘 巩	刘在文	刘纬毅
刘贯文	成葆德	齐荣晋	李元庆
杨建峰	陈扬炯	陈墨章	张 颌
张国祥	张根玉	张捷夫	罗广德
武丕仁	赵劲夫	赵瑞民	赵曙光
郭维明	高 可	高专诚	高培湖
陶正刚	柴泽俊	阎广洪	梁豫秦
谢 恺	谢洪涛	楚 刃	雷忠勤

目 录

- 一、一门九进士 (1)
- 二、从庶吉士到文渊阁大学士 (4)
- 三、康熙皇帝的辅弼良臣 (8)
- 四、主编《康熙字典》和《佩文韵府》 (18)
- 五、其它文化业绩 (21)
- 六、清雅醇厚的诗歌风格 (24)
- 七、实学主张和理学思想 (27)
- 八、康熙皇帝心目中的陈廷敬 (34)
- 九、永难湮没的遗响 (41)

引子

在太行、太岳、中条三山之交的山西省阳城县北留镇北约4公里处,有一座明末清初的城堡式建筑群——皇城村。因清朝康熙皇帝亲笔御书“午亭山村”四个赫赫大字而闻名于世。皇城地处晋城市阳城、沁水、泽州三县之交,东北有樊山如苍龙逶迤而立,村西有樊河似玉带萦绕而过。巍峨壮观的城墙楼阁,与青山绿水相映衬,宛然如画;布局井然的牌坊院落,蕴藏着历史文化,凝重深沉。这里清初曾出了一位集政治家、理学家、文字学家和诗人于一身的著名人物陈廷敬。

陈廷敬,字子端,号说岩,又号半日村,晚号午亭、午亭山人,官至清康熙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入阁的大学士,人称“阁老”,即宰相、相国。作为康熙的辅弼良臣,陈廷敬对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康熙之治”和文化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一门九进士

皇城陈氏家族祖籍河南省彰德府,根据《郭峪里陈氏家谱》记载,陈廷敬的祖上于元末明初从彰德府临漳县(今属河北省)迁入泽州晋城县天户里沟南。沟南村在皇城村东北,与皇城村以樊山为界,相隔十余里。陈廷敬七世祖陈林于明宣德四年(1429)从沟南迁入阳城县郭峪里中道庄(即今皇城村)。“中道庄”的意思是“上下皆村落”,它是中间必经之路。陈廷敬的六世祖陈秀,任陕西汉中府西乡县典史,是皇城陈氏

家族中第一个当官的人。陈廷敬的五世祖陈珙(嫡亲)原是一个一心想考取功名的读书人,因屡试不中,才从事经商活动。陈珙的儿子陈修也同样因科举失意,做起贩卖铁锅的生意,成为一方富户。陈廷敬非嫡系的四世祖陈天祐,为明嘉靖甲辰科进士,官至陕西按察副使,是皇城陈氏家族的第一个进士。陈廷敬的曾祖父陈经济和祖父陈三乐继续经商,家道越来越好,更重视教儿孙读书上进了。到陈廷敬的父辈便见到成效:陈廷敬的伯父陈昌言于明崇祯甲戌(1634)中进士,历任直隶乐亭知县、监察御史、山东巡按、江南提督学政等职。陈廷敬的父亲陈昌期为清顺治甲午(1654)拔贡生。叔父陈昌齐系州禀生(秀才中的拔尖生,由官方发给生活补贴),只是死得早,仅活了24岁。可见到陈廷敬的父辈,陈家的整体文化素质已经很高,成为名副其实的书香门第。

到了陈廷敬这一代,则更是枝荣叶茂、花团锦簇。陈廷敬的伯兄陈元为清顺治己亥(1659)进士,翰林院庶吉士。陈元年长陈廷敬6岁,陈廷敬却比他早一年中进士,也入翰林院。在陈廷敬的七个弟弟中,有一个举人(陈廷翰,康熙甲子科),其余都是贡生。到了陈廷敬的下一辈,出了四个进士,一个举人。陈廷敬的二子陈豫朋,康熙甲戌科进士,入翰林院后任浙江道监察御史、提督湖南学政;三子陈壮履,康熙丁丑科进士,为翰林院侍读学士、内阁供奉;陈廷敬的侄子、陈廷弼之子陈随贞,康熙己丑科进士,翰林院庶吉士;陈廷敬另一个侄子、陈廷统之子陈观颺,康熙丙戌科进士,直隶浚县知县。还有一个侄子、陈廷懋之子陈赅懿,康熙辛卯举人,官任内阁中书。到了陈廷敬的孙辈,出了一个进士和五个举人。一个进士是陈师俭,陈豫朋之子,雍正丁未科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改泗城府

同知；五个举人是陈寿岳、陈寿华、陈传始、陈名俭和陈崇俭，大都任知县。这样皇城陈氏一门明清共出进士九人，举人十一人。进士中有六人曾入翰林院。所以皇城陈氏祠堂有一副对联写道：“德积一门九进士，恩荣三世六词林。”（词林，即翰林，因为对联的平仄而改用）九个进士是陈天祐、陈昌言、陈元、陈廷敬、陈豫朋、陈壮履、陈随贞、陈观颢、陈师俭。有趣的是陈廷敬及其两个儿子（豫朋、壮履）和一个孙子（师俭）四个人同为进士入翰林院，占到“六翰林”的三分之二。

以陈廷敬为代表的皇城陈氏这一北方文化大家族兴起于明末清初，鼎盛于康熙、雍正和乾隆年间，有经济、政治两方面的客观原因和陈氏家族注重文化教育的主观原因。从经济上看，从陈廷敬的七世祖陈林迁入阳城郭峪里中道庄后，经过几代人持续经商的财富积累，已有雄厚的物质基础来供子孙读书考取功名；从政治上看，皇城陈氏家族在明末清初多次受到境内外农民军的冲击，与农民军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当清兵入关打着为明崇祯皇帝报仇雪恨的旗号，消灭李自成农民政权，进而进入山西的时候，皇城陈氏家族无论从感情上还是从保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出发，依附清廷是自然而然的选择。清政府除了用武力镇压的手段外，还采取“怀柔”的办法来笼络汉族知识分子。顺治三年（1646），清廷入关后的第一次科举考试，将进士名额由明朝的 200 余人增加到 400 人。顺治十五年 and 十六年连续两年举行进士考试，这都给正在上升阶段的陈氏家族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国自南宋迁都临安（今杭州），文化中心南移后，北方士人在科举中无法与南方抗争。清初，北方统一较早，政治局面较安定，而南方的抵抗活动几乎一直没有停止。明末受李自成农民军“干扰”较少的江

南乡绅士子对明政权及其残余势力尚抱有幻想,对清政权抱着强烈的抵触情绪,故在清顺治年间,参加科举考试的南方知识分子远远少于北方。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山西阳城皇城陈氏家族的崛起是顺理成章的事。当然,皇城陈氏家族自明万历以后诗书传家,子弟刻苦攻读,形成一个椿荣檀茂、芝秀兰馨的书香门第,也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原因。

二、从庶吉士到文渊阁大学士

陈廷敬出生于明崇祯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单看崇祯十一年对照公元纪年是1638年,但崇祯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农历)已到了公元1639年的元月2日。陈廷敬在8个兄弟和4个姐妹中排行第一。他父亲陈昌期一生娶有二妻三妾。第一房妻子李氏是阳城县白巷里的下庄人,属于大家闺秀,死得很早,没有生育。第二房妻子张氏,即陈廷敬的母亲,沁水县宴庄人,是明万历进士张之屏的孙女,举人、直隶威县知县张洪翼的女儿,很有文化素养。张氏生有六子三女,占陈昌期子女总数的四分之三。陈廷敬从小就受到很好的文化熏陶和家庭教育,母亲张氏对他口授《五经》、《四书》。他天性聪颖,读书过目不忘。他六岁进入私塾读书,九岁时,写成了赋《牡丹》的五言绝句:“牡丹后春开,梅花先春坼(裂开)。要使物皆春,须教春恨释。”意思是:牡丹和梅花,一个开在春天之后,一个开在春天之前。牡丹后春开的用意是叫百花齐放、万物皆春,散尽它们在春天的所有仇怨。这无疑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咏物言志之作。“要使物皆春”,多么境界高远的诗句,难怪引起了当时有识之士的惊异,都说这

孩子从小就抱负远大,将来必是国家栋梁之才。私塾老师王先生在辞别陈廷敬的父亲陈昌期时说:“你这个儿子是个出类拔萃的奇才,不是我能教了的。”陈昌期让自己哥哥的儿子、学识已很高的陈元来教他。当然,陈昌期也把主要精力放在教自己的儿子上面。清顺治八年(1651),年仅13岁的陈廷敬与他父亲一道赴潞安府考试,竟以童子第一入州学。顺治十四年,他参加全省举行的乡试,中了举人。次年,入京考试,就中了进士,年仅20岁。

他原名陈敬,因为在殿试列榜时,还有一个顺天府的进士也叫陈敬。顺治皇帝命令给泽州的陈敬加一个“廷”字以示区别。从此改名的陈廷敬,宏图大展。他初为翰林院庶吉士。庶吉士这一官名设于明初,在新进士中选取文学和书法优秀者充任。清代在翰林院设置庶常馆,选取殿试后取得进士出身、经期考而名列前茅者入馆学习,称庶吉士。陈廷敬经馆试御试均居第一。顺治十八年(1661),他以会试同考官散馆第一名的身份,受任内秘书检讨(掌管编修国史,俗称“太史”)。康熙元年(1662),因母病请假回家,供养了四年。康熙八年,升为国子监司业。康熙九年,升内秘书院侍读。康熙十年,升为侍讲学士。康熙十一年,任日讲起居注官。康熙初年的日讲起居注官,除了把皇帝的一言一行记录在简册外,更要紧的是还要和皇帝切磋学问,交流思想。所以,能任这一职务被当时的人们看做是十分荣耀的事。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正是利用这一特殊的职位,在和皇帝朝夕相处中展露才华,获得赏识和重用的。熊赐履、张玉书、王鸿绪、张英等大臣就是这样起家的。这可以说是陈廷敬仕途生涯中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里程碑。康熙十二年,转为侍读学士。康熙十四年,迁任詹事。康

熙十五年，升为内阁学士，充任经筵讲官。清代，侍读、侍讲只是官衔，只有具经筵官衔者才有给皇帝讲解经史的职责。康熙十六年，改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康熙十七年闰三月十八日，奉命入直南书房，这是陈廷敬仕途生涯中又一次重要转折点。

如果说任日讲起居注官给陈廷敬以接近皇帝的机会，那么，入直南书房使他获得参与国家机密的权利。清代南书房始设于康熙十六年（1676）十一月，是康熙皇帝为自己专门创设的一个机密决策的核心机构。陈廷敬入直南书房，标志着他已成为清廷核心机构的一员。从此，他的政治地位稳步上升，在朝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康熙十八年，他因母亲张氏去世回家办理丧事，守服三年，于康熙二十年返京复任原官。次年，升礼部右侍郎转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任会试总裁。康熙二十二年，改任吏部左侍郎，管理京省粮法。康熙二十三年，升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从康熙二十五年到二十七年三年间，陈廷敬由工部尚书、户部尚书而至吏部尚书，真可谓春风得意，一年一个台阶。

可是，就在他任吏部尚书的当年，湖广巡抚张汧的贪黥案发生了。陈廷敬因为与张汧有姻亲关系（他的二女儿嫁给了张汧的儿子）受到牵连。在审问中，张汧诬陷陈廷敬也受过他的贿赂，使陈廷敬有口难辩。为了不至于影响案件的审查，陈廷敬引咎辞职。这是陈廷敬为官生涯中的一次重大挫折。虽然他的一生受这样的政治打击仅此一次，却对他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去官的陈廷敬并未离京，仍奉旨管理修书的事务。两年之后，也就是康熙二十九年，复起为左都御史。不久，迁任工部尚书。康熙三十年，改任刑部尚书，为会试总裁。康熙三十三年，转户部尚书。康熙三十八年，改任吏部尚书。

从张汧案发经过整整 11 年的跌落回升,陈廷敬又官复原职。康熙四十一年,陈廷敬奉命管理南书房事务,这是一个非正式却十分重要的内廷职务。在此之前,康熙帝最为倚重的汉族大臣之一张英在康熙十六年开始设立南书房时就担任这个职务。陈廷敬继张英总管南书房事务,标志着他的政治影响力的进一步上升。康熙四十二年,陈廷敬任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成为名副其实的辅弼大臣——“阁老”。康熙四十七年,他向皇帝提出“致仕”的辞呈,但未获批准。到康熙四十九年十一月,他终以耳疾为由经多次恳切请退,才获批准。但因编修御制文集的工作尚未完成,他仍得继续留京办事。康熙五十年,首辅大学士张玉书逝世,另一个大学士李光地有病未愈,陈廷敬受命总领阁务。这时的陈廷敬虽然成了名副其实的首辅,但他并没有请求恢复在职的俸薪,每次给皇帝写奏章在落名的时候必加“予告”(离退人员)二字,体现了他不贪位恋栈的“敬慎”之心。康熙五十一年三月下旬,陈廷敬因患二便秘结卧床不起,后又“左腮红肿,中气甚虚”,终于是年四月十九日(公历 5 月 25 日)逝世,享年七十三岁。

综观陈廷敬在京居官五十多年、出入宫禁四十年的仕途生涯,可以用“平淡无奇”、“敬慎始终”八个字作出概括。他的“平淡无奇”,表现在他为人“老成宽大”,从来没有政治野心,不立门户之见,尽量不介入权力斗争,因而他没有突然间大红大紫而炙手可热,也没有突然间大跌大陷而翻船不起。他的“敬慎始终”表现在他的敬业乐群和慎守无过。一“敬”一“慎”构成陈廷敬的为官之道和个性特色。他不是是一个一心向上爬的官迷,而是任劳任怨、无声无息地搞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一直把皇帝对自己的提拔和重用看做是鞭策和激励,一直抱着

“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戒慎恐惧”之心，去完成皇帝的命令。他办事谨行，处在内阁兼内直的绝密之地，从不向别人哪怕是自己的儿子、在翰林院供职的陈壮履，透露任何朝中机密。应该说，作为一代通儒的陈廷敬，既有“修身治国平天下”，“达而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思想，又有老庄藏巧守拙、执后不争的“慎默”的思想，而且使二者达到了完美的统一。假若他纯为儒家的积极用世而不顾其余，他会走向急功迫利的浮躁和浅薄；又假若他纯属道家的与世无争而远祸自全，他会走向消极避世的圆滑和世故。他是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以无为之态创有为之业，故能在风波莫测的险恶仕途中立于不败之地。在清初的宰辅大臣中，他以得到康熙皇帝的“完人”二字的评价而盖棺定论，画了一个满意的人生句号，实属难能可贵。

三、康熙皇帝的辅弼良臣

康熙皇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很有作为的君主，他的武功赫赫，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他的文治卓著，可与“贞观之治”媲美。他的成功，取决于他的雄才大略，也取决于他的善于用人。他的周围有一批汉族文化精英、高层决策之士。陈廷敬就是其中之一。

作为康熙皇帝的辅弼良臣，陈廷敬的政治建树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

（一）激励康熙成为明君，行尧舜之政。

满族入关统一中国后，因为他们比汉族人数少，文化又落后，所以心态就十分恐惧。先是凭借武力，采取残酷的民族压

迫政策,使汉人屈服。但是军事镇压并不能奏效,反而遭到更加强烈的反抗。于是,他们又不得不采取“怀柔”政策,利用假仁假义来磨灭汉人的民族意识。作为汉族知识分子,陈廷敬自然逃脱不了“华夷之辨”的封建正统思想,但他同元代的山西陵川人郝经一样,能冲破狭隘的种族藩篱观念,极力弘扬华夏文化传统,使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行中国之道”,从思想上彻底汉化。康熙皇帝在清朝的十帝中,算得上是一个开明而有为之君。陈廷敬比康熙帝大十五岁。康熙十一年(1672),亦即他三十三岁,康熙帝十八岁的时候,当上了日讲起居注官,尔后又升为侍读学士、内阁学士、经筵讲官、掌院学士。康熙十七年,入直南书房。这种特殊的地位和条件使他能够以讲官的身份接近康熙皇帝,与之一起研究汉学、经史和治国之道,这无疑对处于青年时代的康熙的文化素质和思想建设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我们从《午亭文编》的“经筵讲章”卷可以看出,陈廷敬在经筵日讲中坚持不懈地向康熙皇帝灌输儒家思想、程朱理学,希望皇帝“天德与王道同功,修己与治人兼至”。他在讲述“王道”的时候,不达到“积极感格”的效果决不停止。陈廷敬受命编辑《日讲四书解义》,由康熙皇帝自裁定成书。《四库全书》为此书的卷首提要说:“所推演者皆作圣之基,为治之本。词近而旨远,语约而道宏。”陈廷敬在经筵奏对中,曾告诫康熙皇帝一言一行都影响巨大,必须高度谨慎。又说:古往今来,正不压邪。只有“圣人在上”,才“能使君子道长,小人道消”。陈廷敬在他的这些奏疏中,言必三王之治,一再宣扬尧舜禹汤的崇高品德,惟恐清王朝统治者偏离了儒学的轨道滑行。对于如何处理好君臣关系,陈廷敬向康熙帝进言说:“作为人臣,就得对主上尽忠办事,不应该有求荣得宠的

用心；作为人君，必须有报德酬功的制度。”他一直强调治国之道在于得人。他举例说：“后世如唐太宗执政，差不多达到了尧舜禹的兴盛，也必须有魏徵、房玄龄、杜如晦这样的人为臣，所以能够成为‘贞观之治’，这就是君臣志同道合，以德为人所信服。”又举例说：“从前张良为汉高祖刘邦出谋划策，马援为汉光武刘秀东征西战，也就是得人。”康熙帝也曾经说：“古往今来君臣如果一心励精图治，那么天下就不愁治理不好。”“知人难，用人不易。治理天下的学问，全在这里”。“致治全在于得人。”康熙的见解和陈廷敬的讲述可以说完全一致。正因为康熙帝深知用人之道，在他身边才出现了一大批像张英、陈廷敬、李光地等治世名臣，他们为“康乾盛世”的出现立下了卓著功勋。康熙二十一年（1682），“三藩”之乱（吴三桂、耿精忠、尚之信等三个地方割据势力发动的叛乱）平定不久，陈廷敬及时提醒康熙帝要充分利用国家安定、上下一心的大好形势，制定长治久安的长远战略，但要做到这一点，切不可急功近利，企图一蹴而就。康熙帝对于这些治国安邦的帝王之学极为赞赏，特为《日讲四书解义》一书作序，说自己“孜孜求治，留心学问”，并明确宣布清廷以儒家思想治理国家，决心遵照先圣的教导，力争实现“唐虞三代文明之盛”。

康熙中期，清廷内部的政治斗争十分激烈，这里既有君臣权力分配的矛盾，也有朝臣之间的钩心斗角。康熙二十一年，针对这些权利之争，陈廷敬利用讲筵奏对的机会，向康熙尖锐地提出了要注意“小人”这一重大课题。他说：“古往今来，皇帝的德意不能下达，老百姓的疾苦不能上闻，都是因为有小人在中间作弊。所以贵在能了解这种情况，去掉小人。小人的祸害，是一言难尽的。当他们在没有得意的时候，必然特别会

搞谄媚的伎俩；当他们得志之后，必然会肆无忌惮地施行险毒的勾当。所以皇帝务必要看得清楚，坚决除掉他们。”又说：“君子办事光明磊落，即便有什么过失，人们也容易看见；小人却奸诈隐蔽，患得患失，只要能保住位置受到重用，什么事都能办。小人还会用别人的短显示自己的长，能使君主深信不疑，所以能够专横跋扈而为所欲为。”还说：“小人以谗言陷害君子，并不在大庭广众的公开场合，而在茶余饭后的闲谈时候，使皇上接受而不知不觉。所以，圣人把小人比作白天的贼，只有圣明的皇帝能够严格断绝他们的祸端。”这些论述引起了康熙皇帝的高度重视。他对陈廷敬说：“从来君子得志能够宽容小人，小人得志却不能宽容君子。”后来康熙帝正是由于头脑清醒，及时识别了朝中权奸，铲除了像大学士明珠等权重一时、党羽遍布的“小人”势力，才加强了中央集权和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陈廷敬正是在宫廷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坚定不移地维护君权，反对臣僚专擅营私，才取得了康熙皇帝对他的高度信任。

为了鉴古知今，吸取历史经验教训，陈廷敬以总裁官之职主编了《鉴古辑览》一书，康熙帝为这本书赐名。他在向康熙帝《进鉴古辑览表》中写道（译文）：“我想到尧舜之治，首先务必要知人。诗书之所以传世，为的是记述古代，看前人是怎样办的来立政，考古知今。”这部书的问世，对康熙帝借鉴历史、实行开明政治无疑起到了警策的作用。

陈廷敬在给康熙帝讲经和上奏折中，坚持不懈地提倡儒家的“仁政”和“民本”思想。如他在《请严督抚之责成疏》中严肃地指出：实行“仁政”的关键，在于统治者应“无时不以黎庶为心”，“洞知闾帝之疾苦，历观稼穡之艰难”。官吏的职责就

是“勤民、益民、利民、养民、恤民”。这对康熙帝施政产生到了积极的影响。康熙帝尊崇孔子,赞赏“仁政”。在康熙二十三年冬,他瞻拜了孔庙,“行三跪九叩礼”。他在《古北口》一诗中写有“形胜固难平,在德不在险”之句,说明他认识到国家政权的巩固并不在于军事设施的坚实牢靠和有险可守,而在于行施仁政,得民之心。康熙皇帝在《高邮湖》诗序中,记述了他亲眼看到“居民田庐多在水中,因询其故,惻然念之”的内心感受,以至“凜凜夜不寐”,于是更加坚定了他“拯济须及早”的决心。以后他多次登舟巡视,实地勘测,有效地对淮河、黄河和永定河进行了治理。我们从康熙的言行中不难找到陈廷敬的影子。

(二) 不循成例,因时制宜,帮助康熙皇帝制定有关国计民生的大政方针。

古往今来,发展经济,使人民得以生存,是巩固政权的基础。清政府在统一中国后,也面临着恢复国民经济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清初与明朝一样,对地下矿产曾采取严格控制甚至“禁采”的政策。康熙二十年(1682),清廷以“开矿采铜,恐该管地方官员借此苦果土司,扰害百姓”为由,颁布了“严行禁止,以杜弊端”的谕旨。这就直接影响了货币的流通和使用。清代实行的是不完全的银本位制,银子可由民间铸造,用于大额交易,而铜钱只能官造。银子和铜钱并没有主币和辅币的关系,二者之间的比率只能随市场价格浮动而调整。这样一来,往往会出现货币关系失控的现象。中国不是产银国家,铜的来源也极为有限。康熙年间,国内产铜最大的地区云南因受“三藩割据”的影响,铜产量严重不足,使银铜的比价发生经常性的波动。投机者看到有利可图,便进行大量的私铸,

给国家财政造成极大的危害。平定“三藩”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后,清政府转入恢复和发展生产时期,但铸造制钱的铜远不敷用。清廷为此着急,在殿试中,还出了一道如何解决铜用不足的试题。随后又采纳了云南总督蔡毓荣提出的“鼓铸宜广”的四项措施,但铸钱现象仍不能得以禁绝。康熙二十三年八月,时任经筵讲官、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管理京省钱法的陈廷敬,上疏康熙皇帝说:“今天人民的最大不便,再没有超过钱价了,过去每一两银,可以换一千个制钱,现在却只能换八九百个,所以人们就毁掉制钱去作铜。销毁制钱的治罪最重,然而为什么不能禁止呢?是因为有厚利的存在。”他认为,禁随便铸钱,应改重分量为轻分量。一把每个制钱的重量减轻,毁钱的弊端就不禁自绝。由于当时产铜地方的收税过重,所以致使开采的人寥寥无几。如果停止对采铜生产的收税,任民开采,那么铜钱一多钱价就会平抑。同时,他还提出了具体的政策规定:一是铜铅矿“任民采取,八分听民发卖,二分纳官”;二是优先让产矿地方人报名开采。如果他们无力就让州县人自报开采,允许雇用邻近州县匠工。此外,还规定对铜铅开采的管理条例和税收办法:“各省采铜铅处,令道员总理,府佐分管,州县专管。”道厅官如得税铜铅,每十万斤记录一次,四十万斤加一级。州县官得税,每五万斤记录一次,二十万斤加一级,照数议叙。”并对威逼勒索的上司从重处理。此后,铁铅等矿也基本上照此办理,只是银矿略有不同,官收四分,六分给民。陈廷敬的建议得到了康熙帝的认可。这一“任民采取、与民同利”的矿业政策的推行,大大调动了民间采掘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铜、锡、铁、铝、金、银等矿的开采,矿产量迅速增加,税收源源不绝。仅云南一省自康熙四十四年冬至